

# 那些年,不只有青蒿素(下)

## ——上海地区“五二三”抗疟研究回眸

◆ 杨震

1971年6月,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,这次会议制定了《疟疾防治研究工作五年规划表》,共有7大类15个项目的任务。其中上海的任务很重,共参与6大类11个项目。在原来的工作任务的基础上,上海又接受了预防类药物研制、免疫制剂研制、以及动物疟疾模型建立等任务。之后,上海马于6月中旬组织了贯彻广州会议的学习班,共有21个单位的152人参加,将上海地区承担的任务具体分派给各个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、制药和日化企业。当时正处“文革”中期,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之下,上海革委会把“五二三”任务提到极高的政治高度,要求各家参研单位将“五二三”列为重点项目,并切实保证稳定的科研队伍。

从1971年起,上海的“五二三”任务协作体系相对稳定、运行有序。“文革”后期,上海根据全国“五二三”小组的指导精神,先后于1973年和1976年下达了《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上海地区疟疾防治研究主要任务》《一九七六年上海地区五二三研究计划》。这些任务计划,非常细致地指导了当时上海地区的抗疟研究。

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1977年国家制定了《一九七七至一九八零年疟疾防治研究工作规划》,提出了新的工作重点,并组织了四个专业协作组。其中三个组由上海地区的单位担任组长或副组长:“防蚊灭蚊药械专业协作组”中,上海昆虫研究所担任组长;“疟疾免疫人疟猴模专业协作组”中,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担任组长;“化学合成药专业协作组”中,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和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担任副组长。工作规划还非常详细地提出了1977至1978年的工作进度要求,并细分到各个研究单位。例如在当时已经成为

研究重点的青蒿素领域,上海药物研究所承担了“1977年完成青蒿素的绝对构型研究”“基本完成青蒿素的吸收、分布、排泄和化学转化的研究”“初步阐明青蒿素的作用原理”“改造青蒿素的结构,找到更优越的新化合物供临床验证”等4项任务。在这份规划中,领到任务的上海地区参与单位达到15个,是全国最多的。某种意义上,这份工作规划是当时全国疟疾防治研究的一份综合实力分布图。

### 特殊年代的科研

“五二三”任务的实施经历了几乎整个“文革”时期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科研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,诸多政治活动不同程度地占据了科研人员的宝贵时间和精力。但也必须指出,对于“五二三”这种近乎“举国体制”式的科研工程来说,当年特定的政治氛围之下,也形成了一些简单有效、令人难忘、且如今难以复制的特殊工作模式。

“五二三”研究中,高疟区现场工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现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、危重病例救治、以及药物临床观察等。高疟区多是偏远地区,自然条件恶劣,生活条件艰苦。在那些地区开展为期数月的工作,需要参与人员吃苦耐劳,克服诸多困难。例如,1960年代末,上海派出40人的现场工作组到达海南岛。当时岛上条件极差,工作中需要翻山越岭、涉水渡河。工作组闯过了“生活关”“爬山关”“怕蛇关”等各类困难。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那时的生活条件。一位组员借住在当地农民家里,同吃同住。一次吃饭时,该组员竟然直接从饭里夹到一只小青蛙。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,为了表明对农民兄

弟的感情,经过激烈的“思想斗争”,那位组员还是把青蛙吃下去了。这种现场工作,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。

那个时期的科研工作中,一直非常强调“献身精神”。在各个专业组中,也都能看到这种“献身精神”。“五二三”研究规划将雷式按蚊的饲养与繁殖研究工作分配给上海的科研单位。当时国际上开展按蚊的交配繁殖研究,都要求有恒温恒湿的椭圆形饲养室等一些较高的科研条件。但是国内的研究条件非常艰苦。科研人员在狭小闷热的饲养室里工作,甚至长期用自己双手供蚊子吮吸,成功地培育出实验用蚊。上海第二制药厂研制某种气味趋避剂时,需要开展模拟实用观察。有26位解放军战士自愿参加。他们在双脚踝部和枪带上固定趋避剂后,于晚上伏卧于蚊虫密集的河滩草地中,统计被蚊虫的叮咬次数,以验证驱蚊效果。而在那个时期药物研究中,科研人员“以身试药”的情况亦不少见。

“五二三”研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,就是“协作”。地区之间,同专业的研究组及时、且密集地相互交流。以上海领衔的“疟疾免疫科组”为例,各地区的研究组相互交流计划、总结、简报,及时通讯,互通有无,还相互给予工作建议、进行分工协作,并很快印制了疟疾免疫研究的内部交流专集。这种做法,被全国“五二三”领导小组充分肯定,并向全国推广。可以说,在当年“五二三”这个特殊的体系中,诸多成果都被及时、且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全国同行参考借鉴。

1981年3月,北京召开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。至此,“五二三”这一全国性科研工程宣告结束。1980年12月,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



■ 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《疟疾研究 1967—1980年成果汇编》

印了《疟疾研究:1967—1980年成果选编》,收录了青蒿素等89项研究成果。其中由上海地区单位担任主要研究单位的成果有20余项,占四分之一以上。

这本《疟疾研究:1967—1980年成果选编》的封面上,印有一枚勋章。回顾上海疟疾防治研究的历史,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,尽管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,但中国疟疾防治事业最终取得了成功。而这份成功,凝结着全国各个地区、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。

摘自《档案春秋》2015年11期

##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

高建国



**2. 进入阳澄湖养伤**  
刘飞于1939年9月21日负伤后,从苏州太平桥转送到常熟县横泾镇,先期进入阳澄湖养伤。集中隐蔽在阳澄湖芦苇荡中的伤病员,有刘飞、夏光、黄烽等10多个红四方面军和闽东红军骨干,有苏南红13军革命后裔、汇入“江抗”的东路地区“民抗”的赵阿山、吴有民,有1934年组织的抗战后援会地下斗争者。“江抗”政治部主任刘飞,理所当然成了伤病员的主心骨。“江抗”西撤后,留在苏常太地区坚持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,有青浦顾复生、嘉定吕炳奎部的部分武装和昆山陶一球部,常熟阳澄湖地区有“民抗”总部的一个警卫班及数十人枪的常备队等少量武装。

武汉失守后,国民党在华中敌后留下20余万人枪。“江抗”西撤时,湖区形势异常险恶,一夜之间日伪军布下数十个据点,其中,在南天门等地由德国人指导修筑了一批钢筋水泥结构的永久性工事。日伪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地方杂色武装投降,一些国民党部队溃散后与当地反动武装同流合污,隐身在密密芦苇丛中的伤病员,成为日伪顽匪日夜追捕的对象。附近西董家浜抗日群众同伤病员约法三章:不能生烟火,不能唱歌,不能出港汉。

后方医院既没有固定的病房,也根本不在后方,前后左右都布满了敌人的据点,乍一看,在后方医院养伤,好比是阎罗殿里讨生活。刘飞入院后发现,阳澄湖地区港汉星罗、水网密布,前村后村相望而不可即,没有船只寸步难行。芦苇荡里地形十分复杂,没有人带路根本进不来,进去了也出不去,颇像《水浒》里描写的梁山泊。湖上条件虽然十分艰苦,但却在虎视狼窥的险恶环境中,为伤病员提供了难得的隐身和养伤之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刘飞在莫干山疗养时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,对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作过如下描述:

我们经常流动在横泾、陆巷、肖泾、长浜、张家浜、西董家浜一带,最远的敌伪据点离我们

过一二十里,近的只有几里。情况较好时,农家的客堂、厨房、牛棚、猪圈是我们的病房,卸下的门板,是我们的床位。情况不好,就只能常在阳澄湖上漂泊,数叶渔舟,就是我们的一切。

刘飞入住后方医院之初,是在“水上流动病房”——小船上过过的,先后由24岁的包蕴和年仅16岁的白山两名女护理员护理。当时,刘飞的伤势十分严重,船上药品奇缺,医护人员又缺乏治疗经验。他忍着剧烈的疼痛,一声不吭,常常面带笑容鼓励医护人员克服困难,做好医疗工作。两名女战士天天用盐水给他冲洗伤口,用凡士林纱布条引流,经精心照料,一周后,刘飞的伤口不再出血,未发生恶性炎症。

阳澄湖上的金秋,绿苇如帐,芦花怒放。伤病员们躺在船舱里,无心欣赏充满诗情画意的湖上美景。白天借着秋阳虽然可以睡一会儿,但可恶的铁嘴花蝇在伤病员间飞来飞去专门乘隙叮伤口,大家只好用芦苇叶子来包伤口。入夜,湖上的气温低得让人打寒战,大家把稻草垫子盖到重伤员身上,轻伤员搂在一起,挤在中间的可以凭借相互的体温睡一会儿,隔一段时间就来个里外换班,轮流取暖。有个叫谢锡生的轻伤员从滩外回来,带给每人一节雪白鲜嫩的芦柴根,一咬一口甜水。闽东的伤病员说,跟福建龙眼差不多;常熟籍的伤病员赵阿山说,当地人夏天把它当冰淇淋吃。有人主张组织力量到滩外去挖,但立刻被夏光制止了。芦苇就是帐篷,挖了岂不暴露自己!赵阿山又捉来十几只青壳、白肚、金爪、黄毛的大闸蟹,有人嚷道:海蟹不如江蟹,江蟹不如河蟹,河蟹不如溪蟹,溪蟹不如湖蟹!大家兴致勃勃准备打牙祭,但想到起火违反规定,生食容易腹泻,只得情愿地将大闸蟹放生。谢锡生拍着赵阿山肩膀说,等把鬼子打跑了,我们到你家去,让你老婆烧大闸蟹给大伙儿吃!谁知赵阿山却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原来,他的妻子在“江抗”东进之前,就被日本鬼子残杀了!国恨家仇更激起了伤病员坚守芦荡、抗战到底的决心。赵阿山的身世遭际,后来触动了作家和剧作家敏感神经,不但写进了军旅作家崔夫夫的纪实文学作品,而且成为上海人民沪剧团编剧文牧塑造《芦苇火种》中沙七龙形象的身世背景。

### 14. 上海港口

宋熙宁年间(1068—1077年),贸易中心逐渐转移到华亭东北地区,这里形成的聚落,慢慢向村镇的雏形过度,由聚落而村社,再变成初具规模的小镇。到了南宋咸淳年间(1265—1274年),由于吴淞江的淤塞,一些较大的商船难以进入华亭县最主要的港口青龙镇,转而至上海湾停靠,政府为此在上海设立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分司。市舶司的衙门设在后来的上海县署内。南宋咸淳三年(1267年),在此正式设立镇治,并派镇将驻守。因地处上海浦西侧,便称“上海镇”。宋史专家王曾瑜在《宋代的上海》一文中说:“总的看来,上海在北宋时,仅设酒务,直到南宋后期,大约增设了市舶分司、巡检司和商税务……元初很快在上海设市舶司,作为海运粮站,并且破格升县。上述行政地位的变迁,正是上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,加之人口繁衍、经济和贸易兴旺发达的结果。”这个看法还是公允的。至宋元之际,上海已以巨镇相称,镇上有市舶司,有榷场,有酒库,有驻军,有官署儒塾、佛宫仙馆,商铺林立,鳞次栉比,成为华亭县东北一巨镇。

元至元二十七年(1290年),松江府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县地大产多,民物繁庶难理为由,向中央政府提议析置上海县。次年,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,析华亭县东北的长人、高昌、北亭、新江、海隅五乡地置上海县,县治就在宋代的上海湾。上海县的设立,是古代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转折点,它标志着上海从许多普通江南市镇中脱颖而出,成为县级政治中心之一。上海也从一个普通的小镇,上升为一个县级规模的政区。明末清初,上海的行政区划又进行了沿革,逐步形成了接近今天上海的规模。

坊间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:“港口通,则经济活;经济活,则城市兴。”上海的历史地位与港口兴废有关,上海港口随着朝代变迁、江河淤塞改道而依次出现过几次大的迁移。

青龙镇是上海地区第一个名镇和港口,建于唐天宝五年(746年)。相传三国时期,东吴的孙权曾在这里建造青龙战舰,之后大破

曹军于赤壁。到唐代,青龙镇成为控江连海的海防要地。青龙港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,是唐代对外贸易的新兴港口,航运船只不仅可抵沿海和内河重镇,而且可直达日本、朝鲜。2013年2月上海博物馆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现场,对外披露此次考古发掘中取得的成果:发现唐宋房屋基址、水井、灰坑、铸造作坊、砖砌炉灶等建筑遗迹,出土铜、铁、木、陶瓷器等近2000件——青龙镇的繁盛可见一斑。

唐末至五代已降,随着太湖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,唐代政府特别需要寻找一个海上贸易的港口,青龙镇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,远洋而来的“珍货远物”,大多通过青龙镇“毕集于吴之市”。进入宋代之后,青龙镇与国内对外贸易往来有了发展,据宋嘉祐七年(1062年)所刻《隆平寺灵鉴宝塔铭》所载,到青龙镇的船舶,自杭、苏、湖、常等州月日而至,福建、漳、泉、明、越、温、台等州岁二、三至,广南、日本、新罗岁一至。这时的青龙镇已有“江南第一贸易港”的称号。青龙镇上有三十六坊,有镇学,有酒坊,茶、盐、酒等务都在镇上置有税场,并置有水陆巡司。镇治堂宇及市坊中坊巷、桥梁、街衢井序,犹如一县城。人口杂处,百货交集,所谓“市廛杂夷夏之人,宝货当东南之物”,市容繁华,时人誉为“小杭州”。

北宋政和年间(1111—1113年),官府在青龙镇设立“市舶司”,登记船舶,检查货物,征收关税,发给有关证照,收买政府专卖品,对船舶和货物进行管理。但是长江每年流下大量泥沙,使海岸线不断向西向东延伸。而海潮进退,又造成泥沙沉积,而使吴淞江不断淤浅和逐渐淤塞,使江艰噎,水流无力,积沙难去,以至水患不息,江身浅淤。宋代范成大说“所谓东导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……”吴淞江口积沙的生涨,江身的迂回曲折,必然影响到通航,当庆元元年(1195年)华亭县市舶司撤销后,外商不至,青龙镇的海外贸易也就骤然衰落,镇市的繁荣顿时失色。

## 醉上海

仲富兰

